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80年9月
23
星期二
庚申年八月十五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
风力 二、三级
夜间 晴间多云
风力 二、三级
最高 23° 二
最低 6°

挪威首相努尔利到达北京

欢迎仪式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前广场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应中国政府邀请，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和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努尔利首相在北京期间，将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双边经济关系问题举行会谈。挪威首相和夫人一行还将访问成都、桂林和上海。

欢迎努尔利首相的仪式将于明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前广场举行。



能源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能源紧张的局面已持续了十多年，搞长期规划应该把能源问题摆在首位。

我国解决能源的方针是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大力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改革。这不仅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大措施，而且是向工业现代化前进的重大步骤。

解决能源问题，在近期内为什么不把开发放在优先地位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穷、底子薄，要办的事情很多，要国家一时拿出更多的钱开发能源是困难的。能源建设周期长，一个大、中、小型项目从勘探、开发达到设计能力，需要8年到10年的时间。因此，解决能源问题，如果以开发为主，不仅是我国家物力、财力做不到，而且，从时间上来讲，也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落后，工艺技术落后，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浪费大，近期内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能源一方面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又浪费严重。到处都有“煤老虎”、“电老虎”、“油老虎”，到处都有漏油、漏气等浪费能源的现象。我国能源利用率同世界上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仅钢铁、火力发电、合成氨三项，如果能源利用率达到日本的水平，约少消耗3,000万吨标准煤，占全年能源总消费量的13%以上。由此可见，我国节约能源的潜力很大，大有文章可作。

近两年来，我们在节约能源上，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成效。过去，我们的能源增长速度同工业增长速度是相近的。这两年我国能源增长很少，但工业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抓了节约能源，在工业结构上作了某些调整，降低了能源消耗。如果进一步采取措施，在十年内把能源利用率由现在的28%提高到40%，每年就可节约标准煤1.4亿吨。因此，节约能源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解决能源问题要开发和节约并重

技术改造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要以节能为中心进行结构改革和技术改造。许多企业设备落后，耗能多，效率低。现有的五千多万千瓦发电设备中，约有一千二百多万千瓦是中、低压设备，如果改为高温高压设备，每年就可以节约煤炭一千多万吨。在工业结构上，过去以钢铁为纲，造成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重工业耗能多，轻工业耗能少，要努力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布局上，一些耗能多的企业今后不能再放在缺煤缺电的地区，而要尽可能放在能源基地附近。凡是和大工业争燃料、争动力的“五小”工业，要逐步整顿。狠抓节能，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改革，将会促进工业的现代化，并带动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提高，有利于进一步把经济搞活，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我们狠抓节能，在近期内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放松能源的开发。在量力而行的原则下，我们要专心致志，千方百计为开发能源打好基础，力争几年之后能源工作有较大提高，逐步改善能源紧张的状况。对待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我们的方针是重点抓传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的内部结构上，应当优先发展煤炭和水电。能源的开发，一定要做好前期工作，尽可能缩短建设周期。在制定长远规划、确定建设规模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条件，量力而行，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煤炭、电力、石油三个部门，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则应把开发放在首位，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这些部门也要狠抓节能工作，一方面在生产、生活中大力节约能源；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为其它部门节约能源创造条件。

贯彻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符合我国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节能涉及各行各业，要在社会上全面开展节能活动，各行各业要一齐动手，做出成效。除了重点抓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工业结构、产品结构改革以外，还要十分注意提高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水平，合理使用各种能源，充分发挥经济效益。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我国的能源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决的。

大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列举领导工作中“左”的表现提出：

肃清“左”的影响 恢复“两论起家”传统

新华社大庆9月22日电 “大庆需要在思想上工作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和形式主义的的东西，恢复和发扬‘两论起家’的传统，切实改进各项工作，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这是20日结束的中共大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取得的一致认识。

这次会议，是在学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贯彻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的情况下召开的。大庆市委副书记、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王苏民，代表大庆市委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由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没

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过了时的经验和一些已经不适应现在情况的做法加以清理，而把这些东西当作了一贯的经验。他列举了领导工作中一些“左”的表现：

——在组织生产建设方面有时强调革命精神多，强调科学态度少，片面强调革命加拼命，习惯于猛打猛冲，满足于大干苦干。尤其是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时候，要求职工不怕“脱皮掉肉”，鼓吹所谓的“死打硬拼”，“苦战恶战”，搞突击，拼设备，拚体力，甚至不适当地提倡加班加点，搞连续转。

——在制订计划，安排工作中，

往往考虑需要多，考虑可能少，片面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满打满算，甚至超打超算，干了一些超越客观可能性的事情。在资金、运输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上大项目，贪大求全，不量力而行。

——在油田开发和基本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违背客观规律，不严格按照正常程序办事的情况，造成一些方面的比例失调。市政建设、职工生活方面欠帐很多。在油田开发上，普遍过边勘探、边开发、边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设搞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结果造成地面工程不够完善。

(下转第二版)

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具体研究了民族法制建设问题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下午闭幕。

这次会议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精神指导下，具体研究了民族问题方面的法制建设问题。会议听取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关于认真做好民族立法工作的报告，还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

条例和林管理条例的说明。会议并对《内蒙古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草案）》、《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的修改意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规定一个民族地区的立法权，与会者还反映了有关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在闭幕词中说，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他说，我国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都有特点。要真正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制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就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他接着指出，关于进一步保证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问题，《中央人民政府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

利的决定》仍然适用，但是还不够，还要作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应当组织力量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参加今天下午会议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等。

按照社员意愿改选队干部加上其他措施

梨树县300个穷队初步改变面貌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梨树县300个穷队去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有43个穷队跨入了全县“雷尖队”的行列，有107个队达到全县人均收入125元的水平，有132个队粮食增了产。目前，这一批生产队庄稼长势好于去年。许多队的队办企业多种经营也发展起来了。

据1978年的统计，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300个，其中一部分生产队人均收入不足30元。

县委针对一批贫困队领导班子不得力的问题，充分发挥民主，真正照社员意愿改选队干部。有些队有毛选自荐队长的，社员拥护，领导也以批准。这样，人合心马合套，

天种不上地，秋天遭早霜，年年粮食产量上不去。县委决定用机械化和药剂除草的办法，帮助这些穷队治穷。一批薄弱队资金有困难，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长期上不去。县农业银行尽量从贷款上给以照顾，使他们在上级扶持下，自力更生改变落后面貌。

江苏采取措施扩大猪肉销售

街道社队和私人可设店卖肉

据新华社南京9月22日电 江苏省为扩大猪肉销售，最近规定，除国营网点外，街道、社队和个人都可以设店卖肉。江苏是我国生猪的重点产区。今年上半年，收购生猪760万头，比去年同期增长16.1%。据有关部门分析，今年下半年的生猪收购量还要增加，购销矛盾比上半年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肥猪购大于销的矛盾，江苏省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全省决定除国营网点外，街道、社队和个人均可以设店卖肉。同时充分发挥基层供销社、“双代店”推销网的作用，把付给他们的代销手续费从目前的4%提高到5%。集体和个人销售猪肉，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可以跨区卖肉。

黑龙江省开割水稻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报道：黑龙江省水稻已经成熟。9月15日以来，汤原、阿城、五常等县已相继开镰收割。据测，今年水稻又获丰收，总产可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云南省五金交电公司采访，我们看到一台使用多年的电视机，图像模糊，经过这台仪器检测，一分钟就找出了故障部位：接着，检修人员拔了一下按钮，“叭”的一声，闪出一道紫光，电视机便清晰如新了。

检修人员使用的这台仪器，叫阴极射

何心萍勤奋自学成为科技人才

线管测修仪，是这家公司以商品检验员何心萍为主的科研小组在1978年研制成功的。过去我国没有这种专用仪器，电视机检修工作十分麻烦，象管“衰老”无法修复，用户要花几十元（黑白管）、几百元（彩色管）更换新管。现在，这种仪器能迅速、准确地检查出显象管的病害并进行修复，填补了我国电子仪器的一项空白，获得云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何心萍取得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是研制成功低熔点焊锡丝。过去国内使用的普通焊锡丝，熔点为摄氏183度，用一般电子仪器设备效果良好，但焊接复杂的集成电路，则要求温度不超过摄氏175度，超过就容易烧坏。何心萍和他的助手们研制成功的这种新焊材料，熔点为摄氏146度，适用于

焊接电视机、电子计算机和各种电子仪器的集成电路。今年以来，云南成批生产供应全国。

何心萍只上过中等专业学校，多年在商业部门当检验员。在平凡的工学岗位上，他奋发上进，孜孜不倦地自学英语和原子物理学、金属学、电子学、高等数学等基础理论，刻苦钻研电子科技知识。近两年来，他翻译了《矢量示波器》、《电子计算机》等科技书籍和资料107万字，有的已出版，并写了两篇技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

何心萍目前正在研究能保障精密电子仪器正常使用的快速和慢速两种保险丝管。

本报记者 张炳森 肖远义

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给本报来信说：

我仅是老同志的学徒和助手

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看了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年富力强的懂行副厂长王兆国上任一年抓管理生产创新水平》的报道以后，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因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向老同志学习企业管理，既不懂行又没有做那么多工作。因此，报道对我的评语是不恰当的。

一、第二汽车制造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设的。建设过程中，在政治上、建厂方针上遭到了多次干扰和破坏。党中央领导同志、湖北省委、一汽、汽车总局对二汽的建设和生产非常关心和重视，党委第一书记饶斌同志、厂长贾正夏同志不怕被打成走资派，顽强地带领党委一班人，组织广大职工战胜困难，排除干扰建设二汽，1975年第一辆车型投产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职工都盼望着二汽能尽快生产高质量的汽车。二汽党委抓了企业整顿，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保证生产等项重点工作，又吸取了一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才使二汽投产几年来，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量成倍增长，今年3月中旬实际生产达到了日产95辆五吨载重汽车的设计水平，4月至6月稳定均衡地实现了日产103辆汽车，7、8月份又实现了日产125辆汽车，这是符合生产发展客观规律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党委的领导和广大职工辛勤劳动和工作的成果。

二、在组织管理二汽生产工作中，我仅是老同志的学徒和助手。王惠民副厂长是二汽生产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生产管理的各方面工作，当党组织决定我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时，我怕担当不了给工作造成损失，厂里的老领导都鼓励我，帮助我。王惠民副厂长是有30年管理企业经验的老同志，他对我象老教师教学生那样告诉我应该如何尽快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如何调查生产薄弱环节，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抓生产管理等等。他还亲自带领我到生产现场作调查，处理问题，给我做示范。过一段时间，他让我独立工作。他和段俊杰副厂长多次鼓励我说：“你大胆地干，做错了我们支持你，做错了我们兜着。”有这些老同志的信任和支持，我怎么敢不好好工作呢？由于我没有经验，重大问题我都向惠民同志报告，由他决定，我去执行。看板管理、文明生产、均衡生产工作质量保证体系这三件事就是惠民同志决策的。我虽然分管生产，但在生产技术上丰富的副总工程师胡云焕同志负责，在具体组织生产方面有生产调度处的同志负责，我只是做了一点承上启下的联络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所以体会到，没有老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工作是不会有更大的成效的。我所做的工作与老同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三、我对企业管理并不懂行。我是刚刚进入企业管理工作大门的一个新学员，真正懂行的是那些有30年企业管理经验的老同志，有专业知识的具体组织生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各分厂的生产厂长。在生产管理上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的工作差距差得很远，我决心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和请教，学习技术，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努力工作，为汽车工业多做贡献。

以上看法，如无不当之处，请给予登载。

此致

敬礼

王兆国



竞争逼出来的新局面

——兰州市轻工工业战线巡礼

竞争会落后地区的工业带来发展，还是带来破坏？兰州市轻工工业系统的实践给了肯定的回答。

在兰州市繁华的庆阳路上，有一间铺面不大的门市部，专售各种式样的男女布鞋，每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这是兰州布鞋厂在竞争中新开设的“厂前店”。搞竞争，无非是与人家在产品比质量，比花色品种，比价格。一比就能知道自己短处和长处，从而扬长避短；一比就能前进，企业就有了活力。兰州布鞋厂过去从来是不与人家比的。有些群众批评他们是“一抹黑鞋厂”，颜色品种没有两样。他们也满不在乎。原因何在？包产包销。反正我出什么鞋，商业部门就得收什么钱，出多少，收多少。去年第四季度，情况发生了变化：兰州市场上外地的布鞋畅销。商业部门拒绝给兰州布鞋厂生产的布鞋实行包销，提出把包销改为选择定产。

这种变化打破了厂里的“平静”局面，从干部到工人都坐不住了。想要不争也不行，想要不争也不行。他们把兰州市场上销售的外地布鞋，统统买来，研究对比。他们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习先进技术。“对比，一分析，一学习，问题找到了。注塑鞋底硬度不够，鞋底和鞋帮粘合也不好，穿起来很容易变形和损坏；选材、造型、外观，就更落后了。厂里成立了质量攻关小组，聘请了有关的科技人员来献计献策。根据顾客需要，他们试制了一批造型美观、结构精致的仿皮鞋式样的女布鞋，拿到门市部试销。结果很快就销售一空，商业部门也主动跑来要求订货。之后，他们又利用鞋面的下脚料，制作了价格便宜、式样别致的女布凉鞋，也很快打开了销路。正在

试制的仿皮鞋式样的素头男布鞋，最近也投入了市场。

竞争给兰州布鞋厂带来了活力。截至8月份，商业部门已向他们订货68万双，接近去年全年的产量。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1%，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十倍以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兴旺景象。

兰州市塑料三厂在竞争中的变化，也是很动人的。他们的体会是，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竞争能力，不仅要从质量、花色品种上努力，还要价格比人家便宜，否则照样卖不出去。兰州有个热水瓶厂，产品销路很好。它用的塑料瓶壳，是从杭州运来的。为什么不用兰州自己生产的呢？塑料三厂派人去联系，回答说：“你们的瓶壳，花色品种少，价格比杭州的贵，我们不用。”这个厂两次派人到杭州参观学习，杭州塑料厂大力支持。一比，差距找到了。人家厂里劳动效率高，废品率低。杭州塑料厂一个班组一天能生产500个，而自己还不及人家的一半。这样成本势必要高。参观学习的同志回来以后，发动群众各项攻关，改革操作，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各项开支。经过努力，终于把塑料热水瓶壳的价格一下子降低了六角钱，与杭州一个牌价。于是，兰州热水瓶厂愿意与他们成交了，现已订货40万个，每个月要求三厂供应5万个。

有人说，竞争是企业发展的“精神能源”，有了它，就有了前进的动力。这话有道理。在兰州市轻工工业系统，有些工厂通过竞争，产品质量上去了，发展了，占领了当地的市场；也有些工厂产品质量很好，销路却不佳。这样的工厂，也并非象有些人想的那样会“倒闭”。因为，一搞竞争，工人对自己

工厂命运的关心，与过去大不一样。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生产的门路也就会被多方面地打开，“死”的局面就会变“活”。

举一个例子。兰州市有个三十多人的钢材改制厂，主要生产以钢铁为原料的机械锻，从炼钢、轧钢到出产品，是一条“龙”配套的。前几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铁锹用得最多，商业部门包销，每年生产一百多万把，日子还好过。今年，上边决定这个厂自产自销，年初任务下达了70万把，可是供货合同一张没订。这个厂的产品销售不多，不是因为质量原因——论质量，他们在全同行业评比中，是名列前茅的，主要是省内的需要量减少了。市场的变化，逼着他们走出去，在外地打开销路；另一方面，他们停掉了长期亏损的车间，能转产的立即转产，广开生产门路。炼钢车间停掉了以后，转为锻钢加工，生产市场需要的取煤炉管、油罐、水罐、烟囱等。原来的维修车间，也从“后方变前方”，积极组织对外加工，无论是大活、小活，赚钱多的、赚钱少的，谁求什么活都干。

而且还走街串巷，深入农村找活做。这个四十几个人的车间，以前是靠别人养活，现在每个月能为厂里收入一万五千多元，变成养活别人。这个厂原来以为今年上级下达的机械锻的任务不会完成了，产值和利润也不会有多大“油水”。可是，由于产品远销到山西、宁夏、新疆等4个省区，今年8月7日的产值和上缴利润比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增长。

兰州市轻工工业系统的发展，是竞争逼出来的。竞争给落后地区的工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落后地区不要怕竞争。尽管落后地区的基础条件、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薄弱，比沿海地区要差，但是，只要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前途也是光明的、乐观的。当然，落后地区的工业要在竞争中前进，困难会更大一些。他们希望国家给予适当的扶助。这种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本报记者 郭龙春 欧庆林 张平力

▶

浙江省改革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留成办法

新华社杭州9月21日电 浙江省人民政府最近发出文件，对二轻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税后利润分配办法作了改革。文件规定，这些企业在交纳所得税以后，其余利润实行留成制。留给企业的部分一般不少于60%，具体比例根据不同类型的实际情况确定，有高低，不搞一刀切。例如，对因价格等因素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留成比例可以低一些；对生产急需发展、利润率较低、生产困难的企业，留成比例可以高一些。1979年税后利润在5,000元以下的单位，可以全部留给企业。企业留成后的利润，主要用于发展生产的技术措施费、基本建设投资和补充流动资金，也可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和职工奖励。

为了统筹兼顾，保证

重点项目的建设，搞好行业配套和原材料生产，以及对受自然灾害和意外损失的企业进行救济，文件规定，省、地、市、县二轻主管部门仍可适当地集中一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利润，但上交比例过去大大降低。

过去，浙江省二轻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作工厂，一般都是在县、市范围内统负盈、统收统支。这些企业每年实现的利润，向向上级交纳所得税以后，一部分上交省、地、市二轻工业主管部门和轻工工业局，其余全部交县、市主管局统一掌握，企业需要花钱又得向县、市主管局申请，因而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合作社（组）虽然实行自负盈亏，但纳税后上交给主管局的合作事业基金比例也比较大，影响

企业的积极性。实行新的利润留成办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

上海医疗器械新产品

管型吻合器

过去，直肠病变部位较低的病人，在手术切除后，因手术缝合切断的肠管有困难，大部分病人要在腹部做一个人工肛门，带一只粪袋，给病人带来许多痛苦和麻烦。现在，使用上海生产的一种管型吻合器，大部分病人切断的肠管还能接起来，保留原有人肛门，能正常地排泄粪便。这种管型吻合器是上海手术器械厂六在上海中山医院配合下试制成功的。管型吻合器适用于食管、胃、肠等多种消化道吻合术。经过近一年临床使用，证明比国内同类产品用途广，质量好。

心血管手术全套专用器械

心血管外科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但是，由于缺少成套的专用手术器械，使一些手术很难进行。上海手术器械厂今年4月首次试制成功的全套心脏血管手术器械共有21种，57件，制作精细，基本上能满足从事各种心血管手术的需要。其

要 给 新 产 品 “ 开 绿 灯 ”

一对情侣为操办婚事，到百货商店购买上海第一印染厂设计、生产的“上海之春”阔幅印花家具布。这种花布很漂亮。图案以上海的高楼大厦建筑群为背景，一条欢腾的鲤鱼，喷吐清水，四周饰以回纹，构思新颖，花色浓艳，立体感强。国庆30周年，曾荣获国家家具展销花样第一名。

然而，这对青年兴致勃勃地跑到上海的主要商店，得到的回答是：“无货供应”。为此他们写信给报社，尖锐地批评工厂“展销产品”、“小锅炒”，“昙花一现：市场商品”、“大锅烩”，抱怨产销、消费者看看高兴，买买归时。这样做岂不是沽名钓誉？

记者带着这封信去上海第一印染厂调查，发现工厂的领导干部和设计师们的心情同消费者一样，对此事也非常恼火。财务人员向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生产一般印花布，工厂的利润每米3角；生产家具布，每米利润只有3分。“上海之春”花色浓艳，染料成本比生产一般家具布增加60%，而售价同白地家具布一样，每米亏本2分。

厂长对记者说：“我们设计出的花样，是为了大量投产。可是，不合理的价格，使工厂生产得越多，亏本越多，逼得我们只能少生产，点缀点缀市场。”

这类事情，在外销的产品中也是有的。去年冬季，上海羊毛衫行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的要求，大力改革产品结构，试制成功了5种衫：棉线衫、棉丝光线衫、棉结子光线衫、绵落棉衫、纯棉衫。这5种衫，打破了羊毛衫行业只使用羊毛、原绒的常规，用棉、麻、丝等天然纤维作原料，加工成棉麻一格的产物，引起美国、香港等地客商很大的兴趣，他们竞相订货。棉结子光线衫每件售价6美元以上，其余4种每件售价5美元左右，相当于羊毛衫的售价，比纯棉衫价高出两倍。可是，这种大有发展前途的新产

品无光影彩色电视装置

最近，上海医疗器械厂五厂在天津电视技术研究所协作下研制成功一种无光影彩色电视装置，外型同普通无影灯一样，不同的是在无影灯内装有彩色电视摄像镜头。这种无影灯既可以作为手术照明灯，又能对手术情况进行摄像，通过手术室外部的电视接收机放映出来，便于观摩、示范教学，或对手术操作人员进行检查。这种装置成像清晰、层次逼真；配有对讲机，手术室内外

上海食品工业公司所属食品厂新近生产了一批专供儿童食用的食品供应市场。例如，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新产的一种“智力素”奶糖，内含炼乳、

品，在完成首批定货36,000件以后，就夭折了。

为什么这些产品试制成功后一度停产，或者产量很少呢？工厂的同志说，棉结子为纺纱子纱，专门改革了机台，单位产量和工人看台水平比纺普通纱大为降低；生产绵落棉衫和纯棉衫，损耗比一般羊毛衫多1—4倍，单位产量降低30%；织棉线衫、棉丝光线衫要经过多次定型，成本增加。可是，费工费料生产出来的产品，利润反而低于不那么费工的羊毛衫和腈纶衫。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生意，工厂怎么愿意去做呢？最近，外贸部门适当提高了收购价格，纯棉衫、棉丝光线衫、绵落棉衫3种衫才又恢复生产。

纺织品是重要的消费资料，人民群众要求它日新月异。而我们的纺织品种面孔多，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一贯制”。对这种状况，上海纺织系统的许多干部于心不安，也不甘心。以上海纺织工业拥有的技术优势，完全有可能使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关键是要对创新者在经济政策上给以鼓励，要给新产品“开绿灯”。

第一，要坚持优质优价，按质论价，这是价格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同“稳定物价”没有矛盾。消费者对这条原则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搞新产品应该“名利双收”，要根据政府的价格政策，制订新产品的试销价格，给新产品“生的权利”，让它在市场上接受消费者的检验。经过市场筛选，“适者生存”，促使更多物美、价宜、适合时令的新产品群众众见面。

第二，改变现行纺织品的采购办法。让工业部门有权自销，商业部门有权收购。质次、价高、市场滞销的产品，商业部门有权拒收，由工厂承担经济损失。

第三，奖励勇于创造新产品的工厂和设计师。对于有作为的设计人员，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包括提供各种情报资料，组织外出写生，以及出国考察等。

第四，建立专门的纺织新产品研究机构。

本报通讯员 王复敏
本报记者 吴曼忆



能够通话；还可以配上电视录象机，将手术情况录象储存。

普查癌症的胸部荧光缩影机

目前，我国许多医院检查肺部、食管肿瘤，主要是用爱克斯光拍摄照片，但由于现在使用的一般爱克斯射线机只能拍摄大片，成本高，还不能用于普查。上海医疗器械厂和上海照相三厂、上海机械电镀厂和上海感光胶片厂协作试制成功的胸部荧光缩影机，为普查和早期诊断肺部和食管肿瘤提供了新设备。荧光缩影机采用荧光摄影和爱克斯线摄影原理，使用时，爱克斯线透过人体在荧光荧光屏上成像，由光学装置将图像缩小，拍摄在70毫米见方的底片上。用荧光缩影机诊断，既经济，效率高，每分钟可拍片3张左右，一天能检查500人次以上。

新华社记者 李 琳

上海生产一批儿童营养食品

蛋黄粉等营养成分，有助于儿童发育成长。还有治疗儿童容易患的缺铁性贫血的含铁质糖果，帮助儿童生长发育的“珍珠”奶糖等。（据新华社社）

超微粒干版

超微粒干版是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重要基础材料。它是用平均粒径0.05微米以下的微细氧化银颗粒均匀地涂布在平板玻璃上制成的，相当于普通照相用的底版。制成集成电路，首先要设计电路图，然后经过刻、精两步骤缩微摄影，把电路图拍进这种超微粒干版上，做成掩膜版，再印制在涂有光刻胶的硅片上，最后处理加工而成。

集成电路分为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四种。其发展速度是集成度越来越高，图形的几何尺寸越来越小，因此制造精度也越来越高。它要求超微粒干版必须具有高分辨力、高清晰度、高平整度。所谓高分辨力，就是说用它拍摄的图相虽然很小，但用特殊的方法把它放大后，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其细微的线条。天津感光胶片厂研制成功的超微粒干版在每毫米内可以清楚地拍入三千多黑白相间的线条，而普通的120胶卷只能拍60—70条。超微粒干版的清晰度要求十分严格，干版面每平方厘米面积上，要求大于3微米的尘埃点只能在3个以下。因此，生产干版需要较高的净化工作环境和技术要求。

超微粒干版是伴随集成电路而发展起来的特种感光材料，目前只应用于美国、日本、比利时的少数国家能够生产。它除了可用于集成电路的制版工艺外，还可用于光学仪器制造、核物理研究、全息摄影、情报资料的存储等领域，成为发展电子技术和激光照相技术的键的基础材料。

杨 军 姜义义



是在保护竞争吗？

鞍钢择优自购铁精矿引起的一场风波

编者按 现在，部分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往往又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行政命令的那一套又来了。鞍钢择优范围以内的事情，上级行政领导是不应该干涉的。可是冶金工业部却阻止鞍钢同本钢做生意。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限制竞争，让“大锅饭”继续吃下去。是经济规律部门改变不合时宜的作法的时候了。只有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企业，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经济效果。

本报讯 记者徐放、吴世杰报道：在社会大竞争中，鞍山钢铁公司为择优自购本溪钢铁公司的12万吨铁精矿，与鞍山矿山公司打了一场“官司”，结果，在他们双方的上级冶金工业部的干涉下，鞍钢成

了“败诉者”，迫使他们放弃了同兄弟企业在同类指标上搞竞争。

今年初，鞍钢为了降低成本，降低焦比，使自己的产品在同行业中有竞争能力，曾打听到本溪钢铁公司有多余的品位比鞍山矿山公司

高的铁精矿资源，且售价比鞍山矿山公司的铁精矿每吨便宜11.5元。鞍钢本着择优选购的原则，于4月份同本钢签订了两份共购买12万吨铁精矿的合同。6月27日，鞍钢向冶金部提议，为避免出现积压，鞍钢向鞍山公司调整产量。

鞍山矿山公司闻讯后，立即上告冶金部，说鞍钢这样办，会影响他们执行国家生产计划。冶金部听了双方的报告，认为鞍钢不应该减少使用鞍山矿山公司的铁精矿。同时下令给鞍钢和本钢，立即停止这笔买卖。结果，使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变成了一纸空文。

对这件事鞍钢职工反映：为了竞争，想购买12万吨铁精矿都无自主权。无人保护竞争，竞争搞不起来，企业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效果。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群众提出的一些口号，有很多是起到了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作用，但也有些口号，虽然反映了群众的良好愿望，反映了职工加快发展石油工业的迫切心情，但提法不太准确，或者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而对大多数群众来说一时办不到，超越了现实可能性。因此，我们对大庆过去总结的经验有一个进一步实践检验，重新认识的问题，必须在实际中坚持正确的东西，不断修正那些过时的东西，坚决纠正那些不科学甚至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摸索、总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经验来。

肃清“左”的影响 恢复“两论起家”传统

（上接第一版）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一些投机冒险捞得井，油田至今还在超越实际生产能力采油。有时讲生产指标多，考虑安全方面措施少，曾发生不少事故，其中有的是严重事故。在企业管理的其它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科学、不正规、不严格的问题。

——在领导工作中，搞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只图形式，不讲实效，动不动就找群众动，搞“人海战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搞什么“零点起步”，“大会战会战小会战”，满足于出工人数，会战次

数，不讲工作效率。不愿作细致的科学分析，习惯于大轰大嗡甚至搞打擂比武，在大会上抡喇叭筒，调门喊得很高，实际上有不少做不到，反而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王苏民说，大庆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和形式主义的东，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科学地看待大庆经验。大庆经验是在大庆油田这个具体环境中产生的，一些做法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是对是，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情况的变化，必然有一些东西不那么适用了，或者不能到处适用了。比如



积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



新华社
北京9月22日
电 第五
届政协全
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
会今天下
午在政协
礼堂举行
茶话会,向
五届政协
第三次会
议新增补
主席和常
务委员表
示祝贺。新
老常委聚
一堂,畅谈
如何发挥
政协重要
作用,为发
展革命的
爱国统一
战线和祖
国的四化
建设贡献
力量。政
协主席席
小平出席
茶话会。
政协全
国委员会
副主席王
兰夫在茶
话会上讲
话说,人
民政协一

政协常委会举行茶话会 新老常委欢聚一堂表示

努力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

要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四化建设以及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自由讨论,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要对宪法、法律、法令的实施,对政府工作和各级干部实行监督。他希望人民政协大力贯彻落实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决

议,团结、号召全国各民族、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努力。

屈武、钱昌照、孙晓村、胡子昂、董其武、鄧云鹗、钱端升、黄汲清、周培源、赵朴初和苏子衡在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赞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三次会议召开得好,充分发扬了民主,并且表示要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月到中秋分外明 时到佳节倍思亲

在京台湾籍同胞欢度中秋节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首都今晚五百多名台湾籍同胞在这里欢度中秋佳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京的台湾籍同胞陆续来到了设在北京市政协院内的联欢晚会会场。互相问候的家乡话,使会场的气氛更加亲切。台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陈炳基宣布晚会开始后,大家一边品尝各种月饼和糖果,一边欣赏富有家乡特色的文艺节目。

“月到中秋分外明,时到佳节倍思亲。在这月色如水,桂花飘香的大好时光里,我们在北京的台湾籍同胞,更加怀念家乡的亲人。让月亮为我们送去节日的祝愿,祝大家中

秋快乐,祝家乡的阿公、阿妈身体健康!”两位女青年首先朗诵了这段话以后,接着就是表演唱《中秋节寄深情》四十多名台胞参加了这个表演唱。他们当中有工人、学生和教师,其中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小台胞。手风琴声伴随着他们唱了一曲又一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同唱一支家乡歌,欢乐的歌声唱不尽。”当他们演唱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台湾民谣《天黑黑》、《收酒罉》、《一只乌仔》时,熟悉的乡音,特别受到了老一辈台胞的欢迎。

十名女青年的小合唱,先唱了一支近年来在

台湾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乡间小路》,接着又唱了《亲人啊,只盼早相会》。她们唱道:“妹盼啊姐盼妹,望眼欲穿泪双流,大陆台胞两分开,手足同胞心伤悲。海风啊请你慢慢吹,海浪啊请你慢慢推,扯起风帆好靠岸,姐妹盼

望早相会。”参加小合唱的叶珊谈起演唱这首歌的心情时说,她愿和台湾青年携起手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大陆船只在台湾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货轮“约瑟夫·罗特”号上工作的我国大陆船员,在今3月抵达台湾省基隆港时,台湾海员总工会基隆分会邀请他们登岸并到台北市参观。

右图:台湾海员总工会基隆分理事长方立分,登上“约瑟夫·罗特”号货轮,欢迎大陆船员。



左图:我国大陆船员(胸前佩带贵宾观光卡者),在台湾海员总工会门前与台湾海员总工会工作人员合影。新华社稿

补登几条遗漏了的新闻

编辑先生:

最近,我了解到中国新闻界遗漏了几条科学新闻。我想,有值得提醒各位注意的必要。同时,我觉得祖国的几位植物学家在国际上争得的特殊荣誉,代表了全国同胞的光荣。

去年,中国植物学代表团访美,团长汤佩松,副团长吴征镒、殷宏章,团员徐仁、俞德茂、盛毓桂、李星学、方圣鼎、苏凤林、邱秉钧等10位。美国植物学家推选我负责筹备接待,我陪同了这个代表团旅行了全美国。所以,我很清楚他们的访问经过。他们所经过的城市和学术机构,对他们的访问无不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们诚挚、热情的态度,虚心好学的精神,每到一处都留下他们深刻的印象,轰动了整个美国植物界。临行前,中美双方在加州大学举行了联席会议,具体确定了今后合作的方针,如人员、资料的交换以及学术讨论会的轮流召开等等。今年,美国送了5位植物分类学家到湖北神农架野外考察研究3个月,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同时,中国也要送出好多位植物学家到美国作长期合作、进修。这些都是那次会议中商定的,也是中国植物代表团访美的成就之一。

代表团返国后,团长汤佩松应美国植物学界的邀请,继续多美旅行访问。他以78岁高龄,又在美访问了两个多月。访问了许多他当年在美国求学和教书时的老友和植物学界的流寓,为祖国做了许多科技交流的工作,也争取到了若干奖学金名额,为培养植物

学的接班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一段过程中,美国还有许多城市赠送给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作为一个植物学的工作者,汤老赢得了美国植物学界的最高荣誉。去年6月,在美国植物生理学的年会上,他当选了该会的“通讯会员”,之后,8月份我又与汤老一起参加了美国植物学会的年会,他再度当选了该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他是唯一的同時获得这两个学会的这种荣誉的人,这是终身的荣誉。因为植物生理学的通讯会员在全世界只有固定的25个名额,而植物学会也只有60个固定名额,所以每隔若干年才能有一位当选。这在“通讯会员”在学术上都是有很大成就和对植物学有很大贡献的人。

另外,更使我们觉得光荣的是,继汤老之后,另一位美国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长吴征镒,又在今年当选了美国植物学界的“通讯会员”。吴先生又在分类学及系统生物学上的成就就是有益的。他能继汤老之后当选,在全世界只有60个总名额中又占了一位,世界各报还不多见,吴先生的当选又代表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不仅如此,北京植物研究所的徐仁教授于今年6月赴伦敦参加会议,在会后他被邀请担任明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副主席,这也是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才能得到的荣誉。

我想,汤、吴、徐3位得到的荣誉,代表了中国整个植物学界的成就,我特写此信,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密执安州立大学 戴威廉谨启
植物系教授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北京
(原载《光明日报》)

宋庆龄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外友协名誉会长宋庆龄今天下午在她的住宅会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女士一行,同她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余秋里会见日本石油联盟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今天下午会见以会长永山时雄为团长的日本石油联盟访华团,同他们就发展中日间的石油贸易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

△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9月22日晚设宴欢迎以地区领导秘书局局长阿里·哈桑·马吉德为团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中联部邀请前来访问于22日抵达北京的。

(新华社)

澳大利亚电影周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澳大利亚电影周今天在北京开幕。电影周期间,北京、上海和广州将先后放映澳大利亚故事片《蓝鲸号》、《凯迪》、《悬崖下的野餐》和美术片《多蒂与袋鼠》。

更正:昨日本报第一版消息(佩尔蒂尼总统离京抵西安访问)第六段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冲”应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

一起引起公愤的葬礼

寿阳、昔阳一些人为原寿阳县革委会主任王贵科办丧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大悞国家之慨,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原寿阳县革委会主任王贵科病故后,寿阳、昔阳一些人为了他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葬礼,从中午烧香,点着长明灯,堆满了各样的供品。棺材头前还画着牌位,灵堂里面还摆着“纸洋箱”、“金元宝”等封建迷信祭品。棺材内盛着王贵科的遗体:头枕元宝枕,脚穿登鞋,脸上罩着大红布。孝男孝女站列两旁,一个个戴孝帽、穿孝衣。当棺材被安放到汽车上,运往他老家白峪大队安葬时,棺材上面还拴着一只大哈狗,名曰:“引魂鸡”。汽车一开动,鞭炮齐鸣,中、西两派乐队齐奏“迎亲曲”,成群结队的送殡队伍浩浩荡荡出城外。汽车开到白峪大队村边,把棺材抬下车,立即罩上了古色古香的“棺罩”,又一班乐队在前面开路,把棺材抬到大墓内安葬。大墓前还立了一块高一米的大石碑,上面刻着“王贵科之墓”五个大字。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之多,花圈

打击现行刑事犯罪分子 维护社会治安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结伙盗窃首犯江金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据新华社上海电 最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依法判处结伙进行抢劫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江金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主犯江金平、王建国二人各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处同案犯钱根宝有期徒刑十年、殷仲安有期徒刑五年。

这个盗窃抢劫团伙的为首分子江金忠,从1979年6月至1980年3月,纠集江金平、王建国、钱根宝、殷仲安,携带凶器和犯罪工具,连续盗窃一些工厂、企业停放在马路上的大小卡车28辆,并利用这些卡车到十多个菜场和工厂等单位进行盗窃达二十多次,窃得猪肉、蔬菜以及食品、自行车、工业铜等大量物品。更为严重的是,今年3月16日凌晨,江金忠驾车伙同其兄江金平窜到巨鹿路菜场盗窃,被值班人员沈永林发现,两犯见沈上前捕捉,立即驾车

逃跑。沈永林抓住驾驶室车门不放。为了把沈从车上甩下去,江金忠故意开S形快车,未能得逞,继而又故意将车紧靠路边急速行驶,致使沈永林被撞跌下汽车,头部昏厥,造成重伤。今年1月30日凌晨,江金忠和王建国携带三角刮刀驾车窜至一僻静处,将一路过女青年劫持上车,企图劫财和侮辱,由于被害人反抗、呼救,为群众发觉,江、王两犯将女青年摔倒在路边,仓皇驾车逃走。

江金忠等一伙在抢劫车犯罪过程中,损坏了被窃车辆的门窗和物件。有关单位为修理这些汽车和由于汽车被窃而多付出的运输费共达一万一千余元。这次犯罪多次是屡次违法犯罪,不思悔改分子。江金忠原系上海光明食品一厂汽车驾驶员,因盗窃被强制劳动二年。期满后,继续结伙进行盗窃抢劫活动,危害严重,民愤很大。

走各民族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些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

本报讯 据9月15日出版的1980年第9期《民族团结》杂志报道:为了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使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奔向四化,国家除了在资金、物资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照顾外,还专门组织内地工业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江苏、山东等省市,对内蒙古、云南、宁夏、甘肃、贵州、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对口支援;全国支援西藏。

目前,这种对口支援正日益密切地开展起来,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各省市对中央这一部署非常重视,专门成立机构,加强领导。各对口省市经过互派代表团调查研究,酝酿协商,有的已达成支援项目的协议,有的已付诸行动,有的已初见成效。北京对内蒙古自治区,强调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在互利互利的的基础上,在畜牧业、轻纺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支援和互相协作。上海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支援,重点是帮助银川市对现有工业企业设备进行挖潜、革新、改造,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改善经营管理;并准备在互利的原则下,采取联办、补偿贸易等办法,向宁夏扩散一些产品,由宁夏为上海提供部分原材料。天津市帮助甘肃省进行技术革新已取得较好效果。天津制铁厂技术员,帮助兰州钢铁改制厂解决了机制的铁渣火工艺技术问题,提高了产品质量。天津第一塑料厂的技术员,帮助甘肃有关厂试制成功了新型建筑材料地板砖,为甘肃建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山东对青海的支援,则偏重于科技人员的培训和科学技术的传授。山东部分高等院校已开始接洽青海学生,并准备在教学器材方面,为青海装备五十所中学;还派出教授、讲师去青海讲学,协助进行土壤调查、化验分析,进行人工培植越冬夏草以及太阳能利用的研究、试验等。其它如河北对贵州,江苏对广西、新疆的支援,也已开始行动。

此外,四川省还组织成都、重庆、自贡、渡口4市对省内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对口支援。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们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取得了一些经验,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

忠于职守勇擒罪犯受到人民赞扬

曲贵荣获“人民好警察”称号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四平市9月11日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勇擒罪犯的共青团员、民警曲贵。市委、市革委授予他“人民好警察”的光荣称号。吉林省公安厅给他记了一等功。另有一名民警白云海,在协助追捕同罪犯作斗争中表现英勇,也荣立三等功。

8月17日夜11点多钟,四平市公安局治安民警曲贵、白云海在市内道东和平路一带巡逻

时,发现一个东北黑社会,行动鬼祟。他们立即上去盘问。那人听说是公安局的人,吓得撒腿就跑。他们追了上去,由于那个可疑的人。曲贵立即跳下车向那人奔去。那人拔出匕首朝曲贵左肩臂猛刺一场,转身便逃。曲贵不顾伤痛,紧追不放,曲贵终于见逃脱不了,又反扑过来,刺中了曲贵左腰。这时的曲贵满身是血,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穷追不舍,把罪犯逼进了一个死胡同。

凶犯见前面无路可走,又突然转身朝曲贵扑来。曲贵闪过匕首,猛地抱住罪犯的大腿,将他摔倒在地,用右手掐住他的咽喉。白海赶到时,夺下匕首,给罪犯带上了手铐。曲贵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昏迷过去。这时,由于两个骑自行车青年的报告,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现场。他们协助白云海将罪犯押送公安机关。经驻军二〇七医院抢救,曲贵终于脱离了危险。

据查,擒获的凶犯名叫王文刚,8月17日这天夜里,他正伺机作案时,就落入了法网。

来

函 你报9月16日发表的政协委员朱逢博的发言摘要与事实不符。据我所知,今年参加沈阳音乐周的我省及外省市演出团体,按大会规定,都要演出观摩场一场。去年,我作为辽宁演出团成员参加“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筹备会议,也是这样规定的。这是东北三省的规定。去年中央乐团这样做了,今年音乐周叶佩英、魏启贤,天津歌舞剧院关牧村、于淑珍也这样做了。朱逢博把这说成是“演出公司要按惯例招待一场”,这是不对的。

朱逢博说:“演出公司预先造了许多舆论,挑动一些观众,在我们小乐队演奏时哄起倒彩。”这不对!观众为什么鼓掌倒彩?一、别的几个歌唱家演出的票价都是4、5、7张,而朱逢博的是6、7、9张。群众最不满物价上涨,所以对朱要高价很有意见。二、独唱会晚十几分钟开始,观众不满意。三、独唱会独唱会,观众花钱是来听演唱的,而朱逢博独唱会开演时,给人演的是轻音乐,所以观众就不给鼓掌。人们说:“票卖那么贵,独唱会还拿轻音乐来垫场。”朱逢博不该把群众鼓掌骂于演出公司。

沈阳音乐学院 黄松桥

(二)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9月18日第3版载河北代表金士宣的发言,其中说:“我国现有铁路5万多公里,居世界第4位”,这个说法不对。按现有铁路长度多排列,我国可列第5位,在美国、苏联、加拿大和印度之后。刘进荣

关于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问题，是法学界谈论已久的问题。还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和争论过，但是那时在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法学界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许多同志是主张实行法治的，但也有些同志追溯到古代，论证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所谓“礼治”、“德治”、“法治”、“无为而治”等等说法，大体上说的既有“人治”，又有“法治”，或者二者相结合的。我认为与其把它作为一个从历史探讨的理论性问题来谈，不如把它作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来谈，更有现实意义。

(一)

对此问题，古代有各种不同的学说，但究竟古代历史上有没有我们所讲的“法治”？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有了国家就有了法，它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用以“治国平天下”的。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法治，也可以说自有国家以后就有了的。可是问题在于古代历史上所有各代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国家，尽管统治者也制定一些法律，但它决不是代表广大人民意志，而只是代表少数统治者意志的。统治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的。列宁在谈到罗马法典的时候就指出：“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6页）由此可见，在古代的国家中，哪有什么真正的法治？在这点上，封建主义的统治，同奴隶主的统治，情况基本一样，

谈社会主义法治

陶希晋

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讲什么“变法”、“法治”，也可能有的人开明一些，讲什么“执法唯平”，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代表一小撮封建主说话，目的仍是为着巩固他们剥削阶级的皇权统治。而且任何所谓“贤臣”变法，都必须符合宫廷的“圣意”，否则不仅无法行通，而且要犯滔天大罪。所以归根到底只有“人治”，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发展了法律虚无主义，发展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他们真正是无法无天，践踏一切法律，并且取消和砸烂所有执法机关。可是滑稽得很，他们又编造历史上有什么一贯的所谓“儒法斗争”，说历史上似乎有的王朝也有什么“法治”。他们把“人治”与“法治”的概念，搞得混乱不堪。因此现在我们谈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首先就应当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肃清他们在这问题上的流毒。

(二)

什么叫作“人治”？什么叫作“法治”？所谓“人治”，按古代的说法，最透辟的就是“朕即国家”，“言出法随”。现在来说，就是凭主观办事，有法不依，以言代法。有这样思想的的人，口头上也要法，但他自己却置身于法之外，凌驾于法之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规定或者另作解释，随时可以以权压法，不以法为准绳，而以权为准绳，以言为准绳。“四人帮”在这方面就是最猖獗的典型。

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依法办事，以法治国。1956年，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党

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两句话，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这两句话，又增加了两句，叫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这四句话连起来，我认为就是党中央强调要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

“人治”与“法治”是完全对立的，这不是如象有人所说，它们可以相互结合或者相互并存的。事实上，讲“人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又说，“光有法不行，还必须要有不刚不阿、不牺牲性自己的执法者，既然有人有作用，那不就是包含了‘人治’吗？”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干什么事情都是有人的作用，不能说执法要靠人就是“人治”；同时，那些刚直不阿、不牺牲性自己的执法者，正是坚持依法办事，体现着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实行的正是法治，而根本不是什么“人治”；而且，恰恰是这样一些人，决不被那些有“人治”思想的、习惯于以言代法的人所喜欢，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这与“人治”、“法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民主问题。能否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的法，是由国家权力机关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并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制定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立法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又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证。要“人治”不要法治，实质上就是不要民主。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象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继续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民主真正做到制度化、法律化，那末，就会留给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人以可钻的空子，而社会主义法治也有可能成为空谈。

总之，“人治”与“法治”是总也分不开的。我们不要“人治”，要社会主义法治。“人治”与“法治”二者的分野，就在于前者不要民主，而后者密切联系着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割的。

(三)

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知道，为要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必须有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逐渐完备的各种经济规范和制度等许多同志提出过多关于土地革命的好意见，却被陈独秀等斥为“不通”而遭拒绝。陈独秀等跟着国民党上层分子叫嚷农运“过火”，一再出通告，发指示，压制农运的深入开展。农民运动不能迅速发展起来，是和党在农民运动上的错误政策分不开的。

“八七”会议深刻批判了前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压制农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瞿秋白在代表常委所作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已降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党的武装，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药，造成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并“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这就阐明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要搞武装斗争，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武装斗争也是必须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才能“造出”中国革命的新力量来。离开了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不能持久的，最终要失败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八七”会议一致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了农民暴动的11条口号，明确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协；没收土豪劣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没收地、中地主及一切小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以及对小地主减租、取消高利贷等等主张。这个决议案，实际上是一个初步的土地革命政纲，虽然还不完整，但比以任何一次纲领，都是一个大大进步。更重要的是，“八七”会议决定的土地革命政纲，不仅是一个宣传纲领，只停留在文字上，而且是一个行动纲领，各地的同志在实践中先后按此执行，并认真而切实地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迅速地给中国革命开拓了一个新局面。

当然，“八七”会议也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例如，对土地问题还不彻底，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地强调了退却，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等等。

“八七”会议以后，根据“八七”会议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路线，党带领群众英勇战斗，而从把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式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的新篇章。

律规范的作用今后越来越广泛，以法治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切实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低估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及其思想影响的存。在。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应该承认，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才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钻了空子。”在这里他已经把那种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和根源讲得很清楚，实际上也把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性讲清楚了。

要清除那种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和思想影响，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大家都知道，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把法律看成是束缚手脚的可遵守可不遵守的东西，以及凭权势随便干涉法律、不执行法律等现象，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可是在有些方面，仍然是严重存在的。特别是有些经济部门，对一些搞搞指挥、有意违反经济规律和操作规程等造成的生产事故，甚至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简直不当作犯法，往往是个什么“检讨”，说什么“交学费”就算了。试问，这样还有什么法纪可言！这种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条，恐怕还是“人治”思想在作怪。

(四)

怎样克服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影响，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呢？

看来，首要的是还要继续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民主是多了，而是发扬得还不够，有些民主措施还只是从形式上注意的，而民主实质的内容则注意不够。因此，还必须真正做到“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民主”，通过切实的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积极性。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对立法工作，健全法律制度。现在的法律还不完善，特别是经济工作方面，还有不少是无法可依，必须组织力量加紧进行立法工作和法律整理工作。已经宣布实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可能有的地方准备工作还不充分，有的设施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我们认为，有关法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例如审判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辩护制度以及依法定罪和按量刑幅度判刑等等，法律既有明文规定，就必须切实执行，不能含糊。党中央早已明确地指出，司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排除“人治”思想的干扰，应当说是我们司法工作者首先要遵守的准则。

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一点，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同资产阶级的法治严格区别开来。资产阶级的法治，在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是有过进步意义的，但是，应当看到资产阶级的法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他们的所谓法治，也不过是用以统治劳动人民的一种巧妙的手段。正因此如此，资产阶级所谓法治说成是“万能的”，奉为神圣的，说“法律至上”。这些都是骗人的。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与资产阶级的法治在根本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中起来的意志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服务的。在实行它的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概括起来，就是不要什么“人治”，而要社会主义法治。

•—————•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问题，“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软弱改良主义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庸首先出招，把戊戌变法诬断为“反动的”、“卖国的”，“是一条虚线，行不通的反动道路”。近年来，不少同志发表文章，重新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在讨论到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运动。理由是，改良和改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同修正与修正主义一样，在使用名词上应该是有严格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说法是有明显的政治界限的。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等改良是经常的、进步的措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还要局限于改良，不要革命，那就是改良主义，它起腐蚀和麻痹群众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改良，只反对上述意义上的改良主义。

有些同志认为：改良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它是指19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潮流，想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从这个意义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一切改良运动，都不能叫改良主义。

主张以上这些看法的同志认为，戊戌变法虽然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达到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是进步的，可以说，没有当年的戊戌变法，就没有随后迅速到来的辛亥革命。从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斗争史来看，戊戌变法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范畴，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阶梯”。所以应该把戊戌变法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另一种主张认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理由是，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虽然主张学习西欧，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是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项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把戊戌变法称为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改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认为，改良主义并不都是反动的，随历史前进的。诚然，列宁多次把改良主义斥为反动，但那是针对欧洲的改良主义说的。而戊戌变法时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还刚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主义并不起破坏革命的作用，因此它不是反动的。决不能以列宁对欧洲改良主义的评价来评价中国当时的改良主义；也不能因列宁说改良主义是反动的，就否认承认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在这点上，和持前一种看法的同志，又有共同的地方。

(穆子)



“八七”会议的历史意义

马齐彬 黄少群

1927年8月7日，由瞿秋白主持，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党内同志的要求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召开的，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定了正确方针，团结全党，继续革命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面临着两大危险：一是革命力量有可能被打散，二是党的组织有可能分裂。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很多优秀领袖，很多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极野蛮的杀害，全国突然转入黑暗。不但资产阶级，而且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加入了党但不坚定的分子，大批声明退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我们的党员从“五大”时的57,000多人，下降到10,000多人，党的组织被打入了地下，很多组织被搞垮了。从党的领导机关看，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已彻底破产，而新的领袖、新的方针、正确的路线还没有形成；一些野心分子想分裂党，各地有人则提出了另组第三党的主张。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七月初组成的临时中央（白色）委员会决定，党内一些知名的领袖需要调离原地或去国外，中央机关则立即由武汉迁九江转上海，因而也被许多活动分子误认为是“散伙逃跑”。党内当时存在一种“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情绪，在工农群众中则产生了惶惑和恐惧。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着最危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这是我党战略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重新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斗争的勇气和前进的方向；它不但保存了党的组织，而且用新的方针和路线将党重新统一了起来，使党组织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了。在“八七”会议方针的指引下，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中国革命的大船，终于在狂风恶浪中闯过了激流险滩，避免了倾覆的危险，又沿着正确的航程前进了。这是“八七”会议的主要历史功绩。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卷536页）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同志在发言中，集中而痛切地批判和揭露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尖锐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是革命的作者者，不是革命的主人”；政治局的意见，处处依国民党的“几个土居领袖的意见为转移”，不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反而“抑制群众的斗争”，完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

却不革命”，大家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代表们在发言中，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一致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蔡和森说：“要改变党的指导必须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邓中夏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自从成立到现在……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任弼时具体建议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现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可去莫斯科”。对于共产国际及其派来的代表魏金斯基、罗易、鲍罗廷等，大家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认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没有“革命经验”，鲍罗廷和罗易作了很多错误的指导。当然主要的责任“应由政治局负担”。对新的国际代表和新的中央领导机关，大家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期望。

“八七”会议在与会代表一致主张下，改选了中央领导机关，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八七”会议决定：将党的错误迅速公开传达到全党群众，使全党群众都认识此种错误。会议一致通过的《告全党同志书》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共产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果共产党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党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掩盖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中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八七”会议确定了以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强调：“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民阶级斗争最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中间级可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号召，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在极短期间抽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党员团员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八七”会议刚一结束，中央就立即向各省发出通知，并派人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反动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从此，短短的时间内，各地风起云涌，南昌南昌起义后不久就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许多地方的农民武装暴动，同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武装斗争。在这些起义当中，以毛泽东、朱德和方志敏、贺龙等为代表，在暴动受到挫折后，能适时地从敌人统治上的退却和进攻攻进结合起来，把从政治上退却和进攻的城市退却，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他们在农村和广大农民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

